

呼和浩特首部方志

——《古丰识略》史学价值探析

李治国

(内蒙古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摘要:《古丰识略》成书于清朝咸丰九年(1859年),是呼和浩特历史上第一部地方志。该书在新史料、新角度、新理论方面都有独特珍贵的史料价值。但是长久以来,学界并未给予此书足够的重视。针对《古丰识略》只有手抄本的现状,有必要对该书进行重新校勘、整理、点校出版,补充完善相关史学领域的研究资料更应该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否则在不远的将来,这本书的价值可能会进一步为人们所忽略。

关键词:古丰识略;钟秀;张曾;呼和浩特;方志

中图分类号:K249.3;K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6)02-0034-04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6.02.007

The Initial Chorography of Hohhot

—On the Historical Values in *The History, Geography and Daily Lives of Mongolian and Han People in Hohhot*

Li Zhi-guo

(School of Marxism,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Inner Mongolia Hohhot 010070, China)

Abstract: As the initial regional chorography, the book, *The History, Geography and Daily Lives of Mongolian and Han People in Hohhot*, was finished in 1859 and full of historical values involv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new perspectives and theories. However, it was not given enough attention. Due to 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manuscript, it is necessarily collated, collected and published and the related historical research materials need to be supplemented. Otherwise, the values of this book will be possibly neglected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The History, Geography and Daily Lives of Mongolian and Han People in Hohhot; Zhong xiu; Zhang zeng; Hohhot; the chorography

今天的呼和浩特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为我国边疆地区的重要城市。由于种种原因,呼和浩特相关的历史典籍比较缺乏,且有限的史学资料也有待更好地整理与研究。这些都是研究呼和浩特历史乃至边疆历史亟待解决的问题。《古丰识略》就是其中非常特别的一本。它是呼和浩特第一部地方志,于清后期的咸丰九年(1859年)面世。然而长期以来,该书并未能获得学界相应重视,目前也仅限于《中国方志大辞典》的简单介绍,认为《古丰识略》不及《归绥识略》文字精炼,内容充实。^[1] 这种说法仍

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古丰识略》独特的价值尚需进一步挖掘。

一、作者情况

《古丰识略》有两位作者,第一作者是归绥道台钟秀。钟秀,字石帆,满洲正红旗人。咸丰五年(1855年)八月至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到咸丰九年(1859年)三月,钟秀由北京户部郎中简任,两次担任归绥道台,共计三年

收稿日期:2016-01-02

作者简介:李治国(1980—),男,山东宁津人,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清代边疆民族史研究。

零三个月。^①钟秀其人,在归化城众多官员中,政绩并不算出色,甚至此后的《绥远通志稿》为第二作者张曾立传,钟秀却淹没无闻。他在归绥道任上的任职情况,只有《古丰识略》中有所记载。因为他未能按时按量催征清水河厅的额定赋税,被清廷惩处罢官,经山西巡抚的斡旋,开缺归绥道,作为候补官员留在山西省备用。此后,钟秀被补授冀宁道,官声不好,被人称为无钱不要。^②幸运的是再次因为“讯无实迹”^③,逃脱了惩罚。此后他仕途顺利,先是升任山东盐运使、山西按察使、调任陕西按察使,又擢升至陕西布政使,后调任直隶布政使、江苏布政使,并于江苏布政使任上病故。^④钟秀是一个普通的清朝官员,能为今人所知,重要原因是在他归绥道任内,主持撰写了呼和浩特地区地方志的开山之作。

其实在《古丰识略》的写作过程中,钟秀更多是一个提供资金和资料的角色。该书主要的作者是张曾。张曾,字小袁,山西崞县人(今山西原平市)。道光十七年(1837年),乡试中举人。此后十余年间,到山西及呼和浩特地区,各地方官处做幕僚。因为精明强干,很为各处官员欢迎。清末战乱频繁,张曾积极参与其中,终于因为有功,被授予布政使使司理问,后病逝。除了《古丰识略》,张曾还著有文集,古近体诗若干卷。^⑤

中国历史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很少有类似于内地修撰地方志的传统。到了咸丰年间,清廷已经直接管理呼和浩特地区近二百年,方志这类历史典籍仍是空白。钟秀深感此地,“向顺以来,我国家深仁厚泽,涵濡已久,声教所讫,民物繁庶,洵晋北亦大都也。而志乘之作,至今缺如。”^⑥钟秀有志任于内推动这一空前的文化事业,可是事务繁复,加之塞外文献短缺、人才匮乏,修志的计划不断延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张曾来到归绥道署拜访,愿意承担此项工程,钟秀便高薪延聘张曾主笔该处地方志的撰写。写作过程很顺利,几个月后便成书。因为该书模仿

《钦定新疆识略》的体例,加之康熙帝在《御制崇福寺碑文》中将归化城称为古丰州地,所以将呼和浩特的第一本方志,命名为《古丰识略》。《古丰识略》正是在这两位作者的协同努力下完成,开创了呼和浩特历史典籍的新纪元。

二、《古丰识略》的史学价值

《古丰识略》共分为天部、地部、人部三大部,四十卷。该书独特宝贵的史料价值、史学理念,一些不经意的习惯用法,都在不同方面展现了清末呼和浩特地区的具体情况。

(一) 新角度

《古丰识略》的时间跨度,上迄尧、舜、禹三代,下至清末。内容涉及呼和浩特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传承、风土人情等各个方面的历史史实。清朝以前各朝史料,多采二十一史、《资治通鉴》等书。清代内容,兼有魏源的《圣武记》《钦定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等书。这些内容史料价值一般,但以呼和浩特作为视角,裁剪史料,可以说是史学视角的一种全新尝试。中国传统史学典籍习惯以中央政府为中心,根据各地与首都关系的亲疏设定既定的政治文化秩序。作为荒远苦寒的塞北边城,呼和浩特长久以来都是传统史学的边缘地带。然而在该书中,传统中原王朝的首都、内地,似乎成为遥远的“边疆”,而呼和浩特做为中心地区,成为写作的出发点,并以这个中心观察呼和浩特地区的历史兴衰,王朝变迁,不得不说是其一大特色。历史上,呼和浩特地区被诸多民族、政权相继征服,在这种多民族、多王朝的断裂,与本地区自己连续性的交织下,此书是对传统历史中心视角的新突破。

《古丰识略》的史学理念,暗合近年以来国外方兴未艾的“新清史”学派,以及国内“内亚传统”的史

①(清)钟秀,张曾:《古丰识略》卷二六,人部,官制,内蒙古大学手抄本。

②《清穆宗实录》卷三三四,同治元年六月壬申,中华书局影印版,2008年。

③《清穆宗实录》卷三七,同治元年八月己巳,中华书局影印版,2008年。

④《清穆宗实录》卷二二九,同治七年四月丁酉,中华书局影印版,2008年。

⑤《绥远通志稿》卷九四,人物(侨寓),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⑥(清)钟秀,张曾:《古丰识略》钟秀,序,内蒙古大学手抄本。

学新概念,又不尽相同。例如:“新清史”及“内亚传统”将边疆土地上的人民,固化地认为是少数民族,相关历史记载应是相应少数民族文字记载的历史典籍,这其实与史实并不完全相符。在民族方面,中国古代历史的不同阶段,即使在边疆地区也生活着众多的汉族人民,尤其是清朝大一统的专制王朝建立后,大量汉人迁徙到边疆地区。经过几代的繁衍生息,这些汉人自然不是边疆的少数民族,同时由于长期在边疆生活,离开了内地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使其也不同于内地的汉人。在文字方面,汉字作为中国古代史中的强势文字,边疆少数民族的一些精英分子也认真学习,记载各种文献资料。生活在边疆的汉人更是用汉字来书写。所以边疆史的研究,不仅仅是局限在少数民族成员、非汉文的历史文献,更应有一种综合的区域视角,特别是那些边疆地区生活的汉人,也应是边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丰识略》在一种不自觉中,对这种历史事实进行了全面的记载,不得不说是难得的史学理论贡献。

(二)新史料

最为珍贵的是,因为作者钟秀是呼和浩特的地方长官,有权力直接调用馆藏档案等文献,因此《古丰识略》收集了一些当时地方政府的档案资料,比如公署、官学、义学、教场、税课等等内容。如果不是该书的收集整理,其中很多宝贵的档案资料现在已然散失。其中,《钟秀上抚宪禀》^①尤为难得,该文是钟秀准备上禀山西巡抚的长篇禀文的草稿,详细报告了归绥道地区的政治经济总体情况,并附录了归绥道下属归化城、和林格尔、托克托、清水河、萨拉齐五厅,清末的行政及经济中存在的众多棘手的难题,是难得的一手资料。特别是因为官职的调动,该文并未上报,有幸收藏本书中,着实珍贵。

除了文字资料,另一作者张曾还注重实地调研,几个月间“复不惮劳费,亲历城市乡村,寻山问水,一车一仆,晨出暮归,谋野则获灯下,彼此考订。”^②从而获得了珍贵的调研资料。因为《古丰识略》与《归绥识略》的传承关系,两书重合的史料本文不再赘述,下文主要谈谈《古丰识略》独有的史学价值。

(三)《古丰识略》与《归绥识略》的区别

《古丰识略》成书于咸丰九年(1859年),咸丰十一年(1861年),张曾重修《古丰识略》,改名为《归绥识略》。《归绥识略》因为后出,又经过仔细加工,清末便已经刊印出版。2007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绥远通志稿》共十二册,其中第十二册附录了《归绥识略》,该书从清朝至今传播范围都比《古丰识略》更广。而《古丰识略》很长时间仅以手抄本存世,近年来一些文献汇编仅以影印版的形式出版。不同的传播能力,致使一些年轻学者认为两书其实是一本,如果不做额外说明,笔者担心《古丰识略》的独特价值逐渐被时间消磨,着实为史学一大损失,毕竟《古丰识略》作为最原始的呼和浩特方志,传递出更接近历史本真的信息,这些信息包含以下五个方面:

1. 作者的问题

《归绥识略》是在《古丰识略》的基础上写成,钟秀虽然没有参与太多的写作工作。可是张曾的写作条件都是钟秀资助的。他个人的薪金由钟秀私人承担,需要的书籍、档案等资料,由钟秀提供。在该书的撰写过程中,钟秀一直跟进,根据自己的实地经验,提出各种见解,甚至在《古丰识略》的序言中,张曾自己也声明把钟秀列为第一作者的原因:

“君独不记柳柳州《梓人传》耶?昔京兆尹将饰官署,委群才,会众工。斧斤刀锯者,环立向之。梓人左持引,右执杖,量栋宇之任,视木之能。举曰:斧!执斧者奔,而右曰:锯!执锯者,趋而左。斤者,斲刀者削,皆视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断者。既成,书其上曰:末年月日某建,则梓人姓名也,识略之,作何以异?”

两年后,钟秀罢官去职,张曾在《归绥识略》的作者中,彻底抹去了钟秀的名字,甚至连钟秀的序文也一并删去,不得不说是《归绥识略》的一大缺憾。值得重视的是,在钟秀撰写的序文中,不但详细记述了《古丰识略》成书的过程,还记录了一些呼和浩特清代地方官的一些行政生活的状况,比如钟秀文中提到:

“蒙中成乘委,鞠西包头商人控案,留省八

①(清)钟秀,张曾:《古丰识略》卷三三,人部,艺文(上),内蒙古大学手抄本。

②(清)钟秀,张曾:《古丰识略》钟秀,序,内蒙古大学手抄本。

阅月,回任接办水灾账务暨查,算各属交代,本关历任奏销,并安设各小口。丙辰秋,奉绥远城将军,奏委赴萨拉齐,会同乌兰察布盟长四子部落王,审询乌喇特西宫旗枪毙民命一案,并勘办喇嘛洞,清水河北务,轮蹄鞅掌,历碌无闲,不律隍康,视同隔世。”^①

通过这些记载,让一个鲜活的清朝官员,辛苦忙碌的施政过程,跃然纸上,可以作为清代呼和浩特行政管理方面的重要史料。

2. 卷数的区别

《古丰识略》比《归绥识略》多四卷,分别是卷二占候、卷三象警、卷三十五风俗、卷三十八书籍。其中,占候、象警是古代呼和浩特地区思想史的重要内容。而风俗尤为珍贵,是张曾亲身考察写成,为呼和浩特地区的社会史提供了宝贵资料。至于书籍卷可以做本地文献学的重要线索。

3. 相似卷目中的不同的内容

张曾在重修《归绥识略》中,不知什么原因,有意删除了《古丰识略》所记载的一些呼和浩特地区不好的社会现象。比如:清代,封建礼教禁锢较严,男女关系是一大禁区。而在《古丰识略》中,大量记载呼和浩特地区男女不讲礼法,例如:看戏时,摩肩擦踵,队进队出。踏青时,男男女女,一起嬉闹,彻夜不归的场景,“男女杂坐,履舄交错,风雨间阻,竟夕不埽。其间无耻匪徒,乘机寻衅,海淫海盗,不一而足。”^②在当时的文人看来确有伤风化,但也反映出呼和浩特作为一个新兴的移民地区,一种新的人际关系状态。

此外,该书还用相当篇幅记录呼和浩特地区大量种植罂粟的情况,“罂粟,种者极多,农民颇贪其利,为害不可言状。若以花而言,则盈畦遍野,五色纷纶,塞上田亩中一巨观也,有千瓣者尤佳。惟园中有之种者,嫌其少获。”^③这些呼和浩特历史上另一面的史实都为他书所无。

4. 保留了珍贵的社会史资料

近年来,边疆内地一体化成为边疆史的研究热点。可惜相关的资料,特别是普通人生活状况的资料,相对匮乏。在该书中记载了大量山西人新移民的状况,比如:

“崔封翁,名据元,代州茄解人。少孤贫,只身游塞上,在西乡三间房子一带,种地为业。衣食渐致充裕,性慷慨好施,与过贫乏者,辄倾囊给之。一夕大风雪,梦虎卧门侧。晨启视,则夫妇行乞,妇产一男,恐不能收育,欲弃未忍者也。翁取子之,并以钱米,周其夫妇,问其姓名,不告而去。翁自得子后,家益丰。延师课读,取名映淮。登进士,为县令,有治声。孙五峰,拔贡生,官教谕。曾孙五人,元孙十数人,俱以诗书世其家,为雁门望族。五峰兄弟同科,封翁犹亲。见之人,以为积善之庆。映淮既贵,后有议其非崔氏族者。翁欲命之归宗,族人共挽留之,乃止。迄今无异言,且籍以辉门闾焉。”^④

这是一则典型以耕读起家,通过种地、读书、做官、再做官形成新的士绅的过程。这在内地并不鲜见,可是作为塞北的呼和浩特,移民人中的优秀分子,通过自己家族的数代努力,获得了传统内地的成功,为边疆内地一体化,提供了宝贵的社会史资料。

5. 一些特殊的文字表达方式

《古丰识略》中有这样的纪年方式:“庄烈帝崇祯七年秋七月,我大清兵入上方堡,至宣府京师戒严。”^⑤并且这样的表述方式不只一处。读者如果对清史有一定的解,应该知道康熙初年震动全国的《明史》案,就是因为年号的使用错误,发生了著名的文字狱。在今天看来这仅仅是个时间的不同表述,可在中国的古代,这是尊谁为正朔的原则性问题。《古丰识略》中的明崇祯七年就是清天聪八年,本书只书明朝年号,不书清朝年号,清前期被列为造

(下转第54页)

①(清)钟秀,张曾:《古丰识略》钟秀,序,内蒙古大学手抄本。

②(清)钟秀,张曾:《古丰识略》,卷二,地部,赛社,内蒙古大学手抄本。

③(清)钟秀,张曾:《古丰识略》,卷三九,人部,土产,内蒙古大学手抄本。

④(清)钟秀,张曾:《古丰识略》,卷三十,人部,流寓,内蒙古大学手抄本。

⑤(清)钟秀,张曾:《古丰识略》,卷三一,人部,史鉴,内蒙古大学手抄本。

- 虞佐,辑.北京:国家图书馆,1946.
- [2]陈佐才.重刊明遗老陈翼叔先生诗全集:宁瘦居草[M].陈虞佐,辑.北京:国家图书馆,1946.
- [3]陈佐才.重刊明遗老陈翼叔先生诗全集:是何庵集[M].陈虞佐,辑.北京:国家图书馆,1946.
- [4]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5]陈佐才.重刊明遗老陈翼叔先生诗全集:宁瘦居续集[M].陈虞佐,辑.北京:国家图书馆,1946.
- [6]陈佐才.重刊明遗老陈翼叔先生诗全集:天叫集[M].陈虞佐,辑.北京:国家图书馆,1946.
- [7]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遗民之禅侣[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 [8]王丽珠.撑风老干坚如铁 几度凌霜不改节——明末爱国诗人陈佐才和他的诗[J].昆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3):20.
- [9]张秉祥.民族诗人陈翼叔[N].云南日报,1981.4.24(8).
- [10]张秉祥.关于明末清初云南诗人陈翼叔的生卒年[J].昆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4):4.
- [11]陈佐才.重刊明遗老陈翼叔先生诗全集[M].陈虞佐,辑.北京:国家图书馆,1946.
- [12]梁有億.蒙化志稿[M].德宏:德宏民族出版社,1996.
- [13]明实录·附录:崇祯长编[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 [14]陈佐才.陈翼叔诗集[M].施立卓,校注.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3.
- [15]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6]冯魁.滇考[M].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云南省文史研究馆,校注.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 [17]范承勋.康熙云南府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1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 [18]倪蜕.云南事略[M].李春龙,刘景毛,点校.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
- [19]陈佐才.陈翼叔诗集[M]//影印民国云南丛书.北京:中华书局,2009.
- [20]方树梅.担当年谱[M]//担当诗文全集.余嘉华,杨开达,点校.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
- [21]倪在田.续明纪事本末[M]//台湾文献史料丛刊.台北:大通书局,1957.
- [22]徐薰.小腆纪年附考[M].北京:中华书局,1957.
- [23]圆鼎.滇释记[M]//影印民国云南丛书.北京:中华书局,2009.
- [24]蒙化乡土志[M].巍山:巍山县文化馆.
- [25]靖道谟.雍正云南通志[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26]蒋旭修,陈金珏.康熙蒙化府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79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上接第37页)

反无疑。可是在咸丰年间,此书居然呈递给清朝满洲官员审阅,甚至连满洲的官员也一并署名,竟然有这样的错误,令人惊讶的是后来谁也没被追究,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清后期清政府在文字方面的管控已经大大减弱。

以上所述不仅是《古丰识略》与《归绥识略》的区别,而且也是《古丰识略》独有他书所无的独家史料。鉴于篇幅和水平,笔者不免挂一漏万,不可能将更多该书的价值一一揭示,这也有待其学者们进一步对其进行研究。当然《归绥识略》也有其独特的价值,两书各有所长,就像新、旧唐书,并不能轻视任何一种。目前的整个社会学术环境对古典文献的整理并不十分重视。而古典文献从各种版本的收集、

校勘,乃至录入、整理、点校都是专业性极强,又非常艰苦的工作,这些不足导致历史古籍的总体水平层次不齐,相关从业人员热情不高,都是该领域遭遇的困境。面对这些问题,针对《古丰识略》只有手抄本的现状,对其进行重新校勘、整理、点校出版,补充完善相关史学领域的研究资料,更应该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否则在不远的将来,这本书的价值可能会进一步为人们所忽略,对于呼和浩特本来不多的历史记载而言,将是一大遗憾。

[参考文献]

- [1]中国方志大辞典编纂委员会.中国方志大辞典[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160.